

人之初，性本“良知”

□禾刀

第一次对王阳明有所了解，是十多年前从《明朝那些事儿》里了解到明朝居然有这么一位奇人：饱读诗书，本应舞文弄墨，却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学问看似直白，著述寥寥，却引得天下读书人疯狂追随。

多年来，解读阳明学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阳明学方兴未艾。长期从事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

现代文学研究的周志文在著作《阳明学十讲》解读阳明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秉承“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仔细梳理后呈现出这样的王阳明：“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

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从“后知后觉”的角度看，阳明心学的形成，是他孜孜追求学问而不得，重新寻找的结果。许多人接触阳明学，是从他“格竹子”的故事开始。“格竹子”的失败令王阳明意识到理学“格物致知”的局限性。周志文全面梳理了儒家学问“经”“传”，以及程、朱理学一路传承的历史脉络。求学心切的王阳明对传统虽笃信但不迷信。“格竹子”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学问路径，“龙场悟

道”本质上是他不断思考后的茅塞顿开。

周志文指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思考方式上有着明显不同。阳明“挣脱了几百年以来‘理学’的束缚，提出了‘良知’这个观念”，强调“良知”是人的“天性”，认为“良知的标准早根植于我们的心中，无须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们只要依着这既有的良知去善去恶”，人皆可成尧舜。不难看出，阳明学实际是回归人性本原，从本原出发，认为天下道理不外乎人性本原。正因如此，阳明反复强调的“良知”，并不是读书读来的，也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拂去种种干扰，回到人性的本原，正所谓，人之初，性本“良知”。

阳明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学问门槛，让所有人回到人性本原的平等层面上，实际意味的是对精英权威的反叛。王阳明认为“圣人有很多地方不如一般的人，圣人不可自傲，而一般人也无须自卑，这是阳明意旨所在”。简单点说就是，一般人可以成为圣人，圣人本就是一般人，现实中的所谓“圣人”，只是权威营造的假象。事实上，在学术方面权威并不可取，“一旦成了权威，弊病便产生了，因为既为权威，就不准许有另一种权威存在”。权威有着天然的“排他性”，这是确保权威“子孙万代”的“本能”，其实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彰显。

哲学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告诉人们什么结果，而是引导人们从最本质的角度去思考。阳明学术的另一大贡献是“知行合一”。今天说来通俗易懂，但这是因为前人努力探索乃至反复试错，才形成了今天人们所共知的“常识”。“所谓‘知行合一’，除了指‘即知即行’之外，还应指良知必须在实

践中印证。而‘知行合一’的‘知’，有实践的含义，如指知识，便是指可以实践的知识，并不虚空，也不虚无”。“知”“行”不应孤立存在，“合一”才能蝶化。

除了追求学问，在周志文看来，王阳明还特别重视“兴教”。他办学既办精英之学，也办平民之学，所以“他到一地总会推广社学，兴复书院。社学推行的是平民教育，书院推行的是精英教育，阳明认为两者不能偏废”。他对讲学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讲学的人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圣人模样出来，跟‘愚夫愚妇’讲学，必须和光同尘地用他们的思考方式，用他们习惯的语言，与他们打成一片，才能真正感格他们”。这些即便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不过时。

阳明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延续与阐释，就像与程、朱理学一样，都是儒学阐释的不同分野。阳明学并非没有反对者。虽然阳明战功卓著，但他显然对官场规则不太适应，这也是他尸骨未寒便遭到清算的原因之一。他的学术虽然声誉日隆，但也受到了当权派的打压，比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就是从学术角度看，他的反对者阵营中也不乏李贽、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儒。顾炎武与王夫之的反对更具有现实性，二者认为“阳明主张现成良知，弄得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最后把国家都弄亡了”。顾炎武有句话直到今天依旧振聋发聩，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读书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不经意像是在做历史的拼图游戏。如本书，就把以前读过的张居正、李贽等历史人物有机地串了起来，而且提供了不同的侧面。



李继宏译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著

真正的救赎

□杨曙明

《追风筝的人》是卡勒德·胡赛尼的代表作和成名作。作品出版之后，迅疾风靡全球，版权出售至70多个国家，被誉为现象级经典畅销小说。2006年，鉴于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胡赛尼本人获得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同时，他还创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为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小说主人公阿米尔出生在富商家庭，与其父勇敢、豪放的性格相反，他生性懦弱、胆怯，遇事退却、畏缩，让父亲颇为失望。与阿米尔一起长大的玩伴哈桑，是仆人阿里的孩子，勇敢忠诚，且爱阿米尔胜过爱自己。1975年的一个寒冷冬日，尚为少年的两人惨遭横祸。当阿米尔看到哈桑因他而遭到强人欺凌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勇敢地冲上去与哈桑共同战斗，而是卑怯地退缩逃遁，以致在心中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愧疚。为了排解这种愧疚，少年阿米尔不仅没有坦承愧疚而知耻后勇，反倒以为眼不见心不烦，栽赃陷害了哈桑，使得阿里和哈桑父子俩被迫出走，愧疚由此变成噩梦。1979年圣诞节过后，前苏联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阿战争。这场战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也让无数个阿富汗家庭家破人亡，阿米尔父亲的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最终被迫而无奈地带着阿米尔踏上了逃难和流亡之路。他们历尽千难万险，辗转来到美国并定居下来。成年后的阿米尔，内心始终未能逃脱当年愧疚所形成的噩梦困扰，他无法原谅自己当初对哈桑的背叛。特别是当他从父亲的好友拉辛汗口中得知，哈桑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之后，心中的愧疚达到了极致，良心发现促使他由此坚定了“成为好人”的恒心和决心，梦幻以救赎来排除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愧疚和噩梦。他按照拉辛汗的指点，开始了救赎行动。可是，此时的阿里和哈桑都已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只有哈桑的儿子索拉博，侥幸跟着阿米尔逃离了饱受战争蹂躏的祖国。

人性救赎是《追风筝的人》故事主脉，从开篇到结尾，始终激荡着善与恶、文明与邪恶的碰撞，在揭露和批判了人性丑恶的同时，也颂扬了人性之光辉。虽然表面上的救赎，是阿米尔的个人行为，但其中也蕴含着作者内心深处的希冀。救赎不仅是要赎罪，还要摈弃丑陋、邪恶，摈弃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如此才能完成真正的救赎，让国家和民族获得新生。

胡赛尼曾经多次坦承，阿米尔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其实，即便是作者不说，读者也能从阅读中感知到，这应当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作品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小说定名为《追风筝的人》，从字面上看，并无多少引申义，可阅读过后，你就能隐约感受到其中隐含的无穷内涵：风筝里有童年欢乐，也有少年悲情；有爱恨情仇，也有悲欢离合；有希望追求，也有失望沮丧；有人性光辉，也有人性丑陋……读者对阿富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文章之妙不在于是歌颂还是批判，而在于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是否有推动作用。如果批判能够启迪反思，推动文明，那就应当批判；同样，如果歌颂能够弘扬正义，推动进步，那就应当歌颂。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应当摈弃那种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歌颂而歌颂的偏执理念。我之所以推崇《追风筝的人》，就是基于这个朴素的文学原理。

一串故事，一部信史

□贾天文 王咏梅

《我以我血著华章：〈大众日报〉在沂蒙》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大众日报》在沂蒙创办、发展的历史，书中虽然没有注释，但一字一句都有依据，或者是来自于1939年至1949年《大众日报》报纸的记载，或者是来自于作者的亲自采访和查阅战地记者日记、新闻人书信、照片、地方志、档案、大众日报人自己积累的历史资料等所得。

于岸青是《大众日报》的资深记者，自2007年开始从事《大众日报》历史的挖掘和研究，本着“追求真实”的态度，她对与《大众日报》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等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对第一位深入华东战场前沿的外国记者葛兰恒的研究即为一例。美国女记者葛兰恒1946年11月到达山东解放区，一直待到新中国成立，其间一共撰写了7万多字有关山东解放区的新闻报道，其中一部分发表在上海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上。1992年新华出版社将她的这些文章结集为《解放区见闻》出版，但未能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她

的这段经历长期以来不为世人所知。于岸青查阅了两年多的《大众日报》，撰写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眼中的山东解放区》，让我们从这些记录与观察中看到，葛兰恒以一个“他者”的陈述究竟塑造了一种怎样的山东解放区形象。她写道：“外国记者是‘向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极其重要的通道，正是有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世界才能了解洞察到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变化，尤其是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华东，葛兰恒几乎是唯一的。”这正是作者研究葛兰恒的意旨所在。

自1939年1月1日创刊以来，《大众日报》一直连续出版，因此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迄今为止，对该报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相关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与这些严肃的论著相比，于岸青发挥自己作为记者的特长——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以故事、细节取胜，引人入胜，从大众日报社记者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第一位女总领事朱青的故事就十分有趣。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后，1946年3月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方代表乔治·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由北平飞往济南视察停战情况，朱青作为翻译随中共方面代表陈毅等人迎接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